

# 英美经典儿童文学中的“动物主义”

张生珍

**【摘要】**英美儿童文学中的寓言故事和教育故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动物通常都被赋予工具性价值和他者身份,这类故事的目的是为了培养良善公民,其出发点并不是为了维护动物权利或福祉。自《爱丽丝》系列开始,人类与动物的平等对话也仅存在于儿童与动物之间,但是对话为他们共同地位的提供提供了可能。与儿童一样,动物从没有话语权到被赋予话语权,动物获得话语权后逐步获得主体性地位,为重建人类与非人类的全新关系提供了可能。儿童与动物地位的相似性及其主体性建构的历史演进,成为认识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价值指向。

**【关键词】**儿童文学;动物身份;主体性;后人文主义

**【作者简介】**张生珍,北京语言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学院。

**【原文出处】**《国外文学》(京),2022.3.46~54

**【基金项目】**本文为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世界儿童文学百科全书》翻译及儿童文学批评史研究”(项目编号:19ZDA297)的阶段性成果。

根据《牛津英语词典》(OED)，“动物”(animal)一词可以追溯到拉丁语的词根“-anim-”(有“呼吸”、“生命”、“灵魂”之意)，后来被广泛地应用到英语、法语、加泰罗尼亚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以及英语变体词中。“动物”一般用来指称活的有机体，也可以用来表示所有的生物，或用来区分人类和其他物种。简而言之，这个词既可以表示所有物种，又可以表示人类以外的其他物种。“动物”包含着大量物种，如蜘蛛、水豚、骆驼、鳗鱼、鹰、蝉、老虎、章鱼、猩猩、恐龙等。长期以来，西方哲学定义了人与动物的对立，除人以外的众多生物被归入一个类别。“动物”这个术语被用来将人类提升到所有其他生物之上，并通过种族主义、性别歧视、阶级歧视、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将某些人贬低为非人类群体，使他们在存在的等级中“更接近”动物。人类“例外主义”把人类与其他物种(非人类)隔离开来。

儿童文学尤其重视儿童与动物的关系，以教育主义为宗旨的动物故事把动物当作儿童或者把儿童当成动物，呈现的就是儿童与动物的互换性和同质性。儿童文学“既呈现特定民族的文化范式，又为文化范式所型塑和制约”。<sup>①</sup>在过去的两个世纪，儿童

文学借助动物叙事实现其价值指向，孩子们被含蓄或者明确地要求与动物产生认同感，而后通过与真实的动物和文学中的动物进行互动，他们又将自己定义为独特的人类。

文学世界里的动物形象由来已久。事实上，动物角色和儿童文学自身一样源远流长。追溯数个世纪以来儿童动物奇幻文学呈现的价值思想和创作手法，就能梳理出更大文化背景下人与动物关系的转变。犹太教与基督教共有的观念是人类有权力掌控其他物种的命运。从历史上看，对这种支配力最狭义的理解是绝对权力产生的压榨和虐待，这种极具破坏性的观点，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等级观并驾齐驱，后者在中世纪演变为“伟大的存在之链”。<sup>②</sup>随后，近代法国哲学家笛卡尔的动物观甚嚣尘上，虽然没有削弱这种狭隘的世界观，反而给了现代科学、工业和农业领域更多的自主权去压榨和虐待动物。

机械哲学观将自然界和宇宙看作一部机器，认为世间万物都是机械性地组合而成。也正是基于这一理念，笛卡尔将动植物视为并不具有认知和理性的能力、体验快乐或痛苦的感觉，是受机械规律所支配的“机器零件”，比人类低劣。笛卡尔认为，“所有

物质的东西都是为机械规律所支配的机器,动植物也不例外,一切有物质构成的东西,如同一只时钟受机械原理的支配。”<sup>③</sup>这种“动物是机器”的观点成为利用动物做科学实验的理论支撑,对近代科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理论将动物排除在人类道德范畴之外,为人类肆意虐待动物和利用动物做残酷实验开脱,为17世纪到19世纪期间做动物活体实验和活体解剖的实验者们提供了庇护。人类中心论和机械哲学观为西方世界提供了屠杀、虐待动物的合理依据,影响长达几千年,直至19世纪动物解放运动兴起。

18世纪,随着中产阶级的崛起和识字率的上升,更多旨在教育和娱乐儿童的文学作品亟需待补。换句话说,18世纪见证了真正的儿童文学的诞生,出现了像萨拉·特里默(Sarah Trimmer)《奇妙的历史》(*Fabulous Histories, or, The History of the Robins*, 1786)等经典儿童文学作品。特里默坦诚地呼吁儿童善待动物,同时告诫他们不要“没有底线的善良”,而是遵守“行为准则,这些行为准则规定了人类如何对待动物,也正是万物之灵——人类给了他们生存的空间”。<sup>④</sup>特里默赞同亚里士多德的价值层级理论(即后来的“伟大的存在之链”)、犹太教和基督教共有的人类造物主统治世界之神权。为了向儿童读者灌输价值观,特里默和其他早期小说家借助等级理念等来削弱非人类物种的主体地位。其他同类文学中的动物主角遭遇了同样的命运,如多罗茜·基尔奈(Dorothy Kilner)创作的《老鼠旅行记》(*The Life and Perambulations of a Mouse*, 1784)里的内姆堡(Nimble)。19世纪初,玛丽·皮尔金顿(Mary Pilkington)《奇妙冒险记》(*Marvellous Adventures; or, the Vicissitudes of a Cat*, 1802)、伊丽莎白·桑德汉姆(Elizabeth Sandham)《可怜猫儿历险记》(*The Adventures of Poor Puss*, 1809)以及安莎贝拉·安吉斯(Arabella Argus)《驴子冒险记》(*The Adventures of a Donkey*, 1815)等作品中的动物都呈现了被人类支配的悲惨命运。这些作品在1824年左右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那时英格兰的第一个动物慈善组织“反虐待动物协会”刚刚成立。19世纪这些以第一人称进行叙事的故事或自传非常流行,以安娜·塞维尔(Anne Sewell)的《黑骏马》(*Black Beauty*,

1877)为巅峰。这类作品都渗入到小读者丰富感性的内心世界,聚焦于人类虐待动物的残忍行径,有时还会引发社会变革,从而促进动物生存环境的改善。19世纪的儿童文学作品中,大部分动物角色都是人类或残忍或善良之行为的客体,而不是能掌控自身命运的主体。

但大多数情况下,现代儿童奇幻动物小说摒弃了动物现实小说的创作模式,超越了动物的弱势地位,展示它们有能力打破人类等级制度,从而获得与人类平等相处的能力。此类文学帮助儿童读者远离传统的刻板印象,不再把动物视作工具或无关紧要的存在,以全新的观念和方式认识其他物种。奇幻小说尤其赋予动物使用语言来进行自我定义的能力,为儿童读者拓展了更开阔的想象空间,提出了动物与人类平等的理念。

### 一、作为客体的动物

通过动物拟人化实现伦理教诲或意识形态的灌输由来已久,这一过程“跨越动物世界和人类社会的自然疆界,将人类的思想情感、性格倾向、喜怒哀乐、爱恨情仇,以及包括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等因素的各种社会属性投射在作者描写的动物角色身上”。<sup>⑤</sup>安德鲁·欧玛利(Andrew O'Malley)在《现代儿童的形成:18世纪末的儿童文学和童年》(*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Child*)中断言,儿童概念的出现同中产阶级这个概念的出现相一致并非偶然,他们都是特定的文学受众。在这个构想中,动物在“人类成长的过程中”扮演着“塑造人格和社会意识……的重要角色”。<sup>⑥</sup>换句话说,为中产阶级儿童创作的作品明确地使用了拟人化的动物角色,旨在“向年轻人传递中产阶级的价值观”。<sup>⑦</sup>

呼应这一理念,面向儿童的动物故事成为教育儿童的有效载体。约翰·洛克在《教育漫话》(*Some Thoughts Concerning Education*)中提出,除了《伊索寓言》外,没有适合儿童的书籍,从而使得寓言成为儿童文学入门的基础。在洛克信奉的美德和良好习惯中,他特别强调对待动物的仁慈。他观察到,如果不加以教育,孩子们“通常会折磨和非常粗暴地对待落入他们手中的小鸟、蝴蝶和其他弱小动物,这似乎是一种乐趣”。<sup>⑧</sup>鉴于这种倾向,父母需要时刻密切关

注自己的孩子,抓住一切机会教导他们应该善待其他生命。同亚里士多德一样,洛克认为对动物的残酷行为如果不被制止,那么这种行为也会施加到周围的人身上。基于这一现象,18世纪的儿童作家经常使用动物作为教导工具,鼓励儿童善待和同情穷苦劳工和动物。动物在将儿童培养成公民的教育中扮演了主要角色,这开创了儿童文学领域的先河。洛克对良好公民的呼吁在后世的动物故事中得到了共鸣。从维多利亚时代小说中反对残忍的行为到安娜·塞维尔的《黑骏马》等都表达了动物权利必须成为公民社会的一部分这一思想。

在第一批面向中产阶级儿童、使用动物角色的教育文本中,萨拉·特里默的作品正是洛克的教育思想渗透儿童文学的早期例证。特里默的《奇妙的历史》讲述了两个家庭,即人类家庭和鸟类家庭如何学会和睦相处的故事。毫无疑问,这两个物种传授给子孙后代的生活经验与洛克的理念一致。洛克向父母们提出了一连串警告:“不能容忍幼稚引发的残忍行为,不管对昆虫,对鸟类,对小动物,对宠物,还是对其他人类同伴。”<sup>⑧</sup>特里默强化并肯定了这一主张。在《奇妙的历史》中,本森一家(Bensons)是上层阶级,虽然没有头衔,却是一个拥有大量房产的乡绅家族,处在中产阶级向贵族的过渡阶层。作为拥有土地的绅士家庭,他们处在中产阶级以上的位置,非常适合传播道德和价值观,可以更有效地呈现中产阶级读者所期望的生活愿景。他们最近的邻居恰巧是在花园墙上筑巢的知更鸟一家。特里默描绘了人类和鸟类父母鼓励他们的孩子以道德和端正的方式生活,但在对待非人类物种时,人类却自然地流露出人类优越性的价值观念。

卢梭在某种程度上减弱了特里默等作家明显的说教意味,提倡让儿童文学中的动物角色发挥除教诲以外的其他功能。卢梭认为儿童应当“自然成长,而不是遵从强加给他们的道德规范和学习要求”。<sup>⑨</sup>卢梭在《爱弥儿》(Emile, 1762)中假定了儿童对动物的善意是源于对它们天生的同情。在《爱弥儿》中,卢梭致力于阐明一种教育模式,即在现代文明产生负面影响时,这种模式依旧允许人类个体“天生的”道德存续。根据卢梭的说法,年轻人倾向于认识到

他们与非人动物的相似之处。他指出,为了培养怜悯和敏感,儿童需要意识到“有同类也在遭受他所经历的苦难,感受到与自己一样的痛苦,儿童能认识并理解这一切”。<sup>⑩</sup>卢梭认为,人类怜悯的唤起需要超越自我、抛弃人类自身的本性,才能与受苦动物产生认同。<sup>⑪</sup>这种实现动物认同的需要是对一些其他观点的回应,即动物具有免于遭受折磨的权利和自由,并在那个时代的文学作品中通过动物与人类的互动得到了重新审视。

卢梭所主张的儿童与动物之间具有“天生的同情”,也是西方动物故事和儿童文学的母题。毕翠克丝·波特(Beatrix Potter)的《彼得兔的故事》(Peter Rabbit, 1901)将彼得兔时而定位为一只被驯化的兔子,时而塑造成一个顽皮的孩子,揭露了儿童与动物的联系。儿童和动物都被归类为“他者”。在18世纪早期,当《野孩子彼得》成为轰动一时的作品时,一般意义上的野孩子,尤其是狼孩激发了丹尼尔·笛福的想象力,笛福在他的小册子《描绘自然》(Mere Nature Delineated, 1726)中对此进行了研究。两个世纪后,玛丽娜·华纳(Marina Warner)的《怪物管理》(Managing Monsters: Six Myths of Our Time, 1994)以及艾米丽·休斯的《荒野求生》(Wild, 2013),这些作品也探索了儿童与动物的关系以及二者之间的共同点,即孩子们探索他们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

两个弱势群体(即儿童与动物)之间的亲密性以及希望二者获得权力的意图也隐藏在儿童文学中。E.B. 怀特的《夏洛特的网》(Charlotte's Web, 1952)和乔治·塞尔登(George Selden)的《时代广场的蟋蟀》(The Cricket in Times Square, 1960)都展现了儿童反抗成人蔑视动物的思想和行为。马里奥和蟋蟀的友谊仅持续了几个星期,但忠诚可靠。弗恩与小猪威尔伯的友谊慢慢淡化,让儿童读者对人类与动物的关系产生了更模糊的认识。事实上,怀特的小说提出了这样一种观念:由孩童领导的和平王国仍旧是个王国,而等级制度内在的不平衡性威胁着理想化的社会。众多诸如此类的小说赋予了动物会说话的能力,于是动物能直接与小读者进行交流。这在一定程度上教会了儿童尊重、善待动物,也打破了二



者之间的壁垒。他们都认识到了成年人的虚伪和自身的从属地位。

儿童是人类最能体现动物属性的阶段,和动物非常接近,这些特征无形中就令成年人将儿童与动物看作同一类别,都是需要被教化、赋予理性思想的对象。凯瑟琳·邦德·斯托克顿(Kathryn Bond Stockton)认为,“动物与儿童的联系以及这种关系的生成,认为儿童和动物都是‘他者’身份。”<sup>⑧</sup>在这样的等级关系中,儿童和动物都是被教化、被凝视的对象,是被动的客体。因此,从作家创作角度来讲,儿童与动物属于同一范畴,二者拥有天然的亲近关系。儿童作家厄休拉·勒古恩揭示出儿童文学动物故事中隐含的成人心理:“我们之所以鼓励孩子对动物感兴趣,是因为我们认为儿童是低等、智力不发达、人性尚未完善的原始人,于是宠物和动物园故事便顺理成章地成为引导儿童晋升到成人的自然步骤,训练他们从无智、无助的婴儿阶段到智力成熟和极具控制欲的成人阶段。”<sup>⑨</sup>儿童与动物的关系中隐含着成人过分操纵儿童的动机与事实。

## 二、对话与颠覆:主体性建构的假设

19世纪文学作品中,大部分动物角色都扮演着客体或工具的身份,而不具备主体性,也无法掌控自身的命运。20世纪,皮特·辛格(Peter Singer)的《动物解放》(Animal Liberation, 1975)以及更加激进的动物保护组织出现,如牛津团契(Oxford Group)、<sup>⑩</sup>动物解放阵线(The Animal Liberation Front)和人道对待动物协会(People for the Ethical Treatment of Animals),昭示着一种划时代的转变:动物不再是人的附属财产,而是权利的拥有者。现代动物奇幻文学直接影响了这些理念的演变,从动物福利到动物权利之主张的转变。包含大量动物间对话的儿童文学作品塑造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角色,传达了深刻的思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奇幻作品中拟人化的表达并没有让动物失去天性,而是突出它们会说话的能力,彰显动物独立生存的力量。这种表达重新赋予动物本来的天性,由此它们代表的就不仅仅是人类对道德的判断标准。从刘易斯·卡罗尔的经典之作《爱丽丝漫游奇境记》(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 1865)到1975年辛格(Peter Singer)发表的《动物解放》宣言,英美奇幻儿童小说中人与动物之关系就是对人类思想

发展的探源,了解这一引起20世纪最伟大的解放运动以及少数族裔、女性和性少数群体的平权运动的思想则具有重要价值。

在《我思动物故我在》(The Animal That Therefore I Am)一书中,德里达质疑西方哲学家从笛卡尔到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所提出的“语言历来就是人类和非人类动物的区别”<sup>⑪</sup>这一论断。笛卡尔尤其坚持认为“动物与自动装置类似”,<sup>⑫</sup>它们可以对刺激做出反应,但不能像人类一样对语言作出回应。然而,德里达质疑笛卡尔的思想路线,即认为人类能主宰动物是源于对动物理性和语言的否认,动物缺少理性这个天生的言语行为。德里达认为人类和动物的界限存在“可渗透性和不稳定性”。<sup>⑬</sup>

动物需要借由语言获得其主体性。为儿童读者创作的诸多小说都赋予了动物说话的能力,促使儿童认识动物、尊重善待动物,从而打破儿童与动物之间的壁垒。动物开始成为故事的主体。它们拥有自己的语言、自己的主体意识,以及自己的“社会”结构。最为典型的要数《爱丽丝漫游仙境》。那只吸引爱丽丝进入兔子洞的白兔子穿着人的衣服,带着怀表,甚至说了人类的语言(担心自己要迟到了)。它没有与爱丽丝交谈,而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爱丽丝紧随其后进入兔子洞,始终以旁观者的身份游历了这个自成一体的新奇世界。她只是仙境的体验者,一觉醒来幻境消失,又被仙境排斥在外。爱丽丝不是故事的中心,她是奇幻仙境的见证者,是用来展示仙境的工具。传统人类中心的主客体关系被颠覆。奇幻故事如《怪医杜立德》(Doctor Dolittle)系列和《夏洛特的网》(Charlotte's Web)等都以跨物种对话为中心。让动物说话,实际上是赋予它们主人翁地位。动物的话语能与人类并行不悖,那么小说塑造的世界就更加平等,其真理感就更趋近于对话主义。在《夏洛特的网》和《弗里斯比太太和实验室的老鼠》中,动物们能说会写的本事是其与人类和谐相处的关键。在更广泛的领域,《夏洛特的网》和《时代广场的蟋蟀》再现了动物模仿人类行为以及这种行为被赋予的不同程度的权力。赋予动物直接对人类说话的权力和能力,在动物与人类关系中,语言扮演了重要功能。

语言是赋予动物权力的重要工具,使它们能够

控制世界,更多地了解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类,并能更直接地与他们接触。若动物能够在对话中发出自己的声音,那么它们就有可能颠覆人类话语的绝对权威。同样,“人类努力学习动物的语言而不是动物学习人类语言”,<sup>①</sup>这有助于赋权给动物并鼓励读者尊重他们。类似的观点出现在《弗里斯比夫人和实验室的老鼠》的最后一章中。它展示了一种更典型的情况,即动物试图学习人类语言,但当老鼠大大提高了他们的语言技能,变得比他们的人类压迫者更聪明之后,就会颠覆传统的权力结构。

儿童文学学者如罗宾·麦考姆(Robyn McCallum)和约翰·史蒂芬斯(John Stephens)都已经认识到巴赫金(Mikhail M. Bakhtin)的思想是研读青少年和儿童文学的有力武器。巴赫金的“道德启示”同样可以应用于动物小说、儿童和青少年小说,以及更早的小说,甚至是维多利亚时期的儿童文学(如刘易斯·卡罗尔的系列小说),这些小说或许并不挑战现有统治秩序,但都与此相关。巴赫金提出“狂欢节由内向外、颠覆和自上而下持续转换的怪异逻辑”。<sup>②</sup>在动物与人类并存的奇幻世界中,不仅让动物由客体转变为主体,还让它们“暂时性地拥有凌驾于人类之上的权威”。<sup>③</sup>奇幻故事中,通常处于弱势地位的动物或动物群体能够短暂地获得授权,拥有权力。在《爱丽丝漫游奇境》《柳林风声》《怪医杜立德》系列、《欢乐满人间》系列、《本和我》(Ben and Me)《夏洛特的网》以及《弗里斯比太太和实验室的老鼠》等作品里,人类与动物间的权力斗争表明,物种间的等级制度并不像其表面那样坚不可摧。动物们拥有自己的声音,能够与人类一决高下,并抵制人类对它们的物化(客体化)等等。这正是现代动物奇幻小说的创作理念,即支持拟人化处理方式,以此抵制人类中心主义观念,反对将动物价值工具化的倾向。

每一个奇幻故事都在处理人类与动物之间不平衡的力量关系(权力关系),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有助于我们理解如何纠正这种不平衡的力量。每一部奇幻作品的读者都受邀参与梦幻世界、农场或城市街道上的狂欢聚会活动。人与动物是平等的,所有等级秩序都不复存在。虽然时间很短暂,但狂欢活动却带来了推翻世俗统治者的希望。借助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有助于阐释在动物会用人类语言表达思想和

进行自身定位的情况下,读者们在阅读过程中如何沉浸到与动物对话的情境之中,同时也激发了人与动物之间的道德联系。

### 三、后人文主义视野下人与动物关系的重构

“后人文主义”(posthumanism)一词由卡里·沃尔夫(Cary Wolfe)提出。沃尔夫追溯20世纪90年代中期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话语体系时,首次使用这一概念,指出“从谱系上讲这个词的根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sup>④</sup>其思想与福柯在《词与物——人文科学的考古学》(The Order of Things: 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所预言的人类主体性观念即将消亡相一致:“作为近代发明的人或者说人类主体,或许就快要走到尽头了。”<sup>⑤</sup>后人文主义的主体观就是反对以“人”为本质的人类中心主义世界观,无论是基于物种还是性别,而是将人类视为一个“集合”。<sup>⑥</sup>后人文语境下,动物与人的平等地位甚至是颠覆性地位。所有以动物为主角的例子都说明了动物在人类想象中占据重要而又矛盾的位置,既是我们(人类当然也是动物)又是他者(人类经常被定义为与动物不同)。后人类哲学致力于承认和重视多形态的动物主体性,德里达认为动物王国所具有的“巨大的多样性就体现在儿童文学中丰富的动物角色”。<sup>⑦</sup>2017年凯特·格林纳威奖(Kate Greenaway)提名的93个奖项中,有65部作品以动物比如熊、獾和蜜蜂为主角。这个数据具有重大意义。

2008年,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提出极富革新性的理念,即人与动物关系模型——“同伴物种关系”(companion species)。她认为动物与人之间的互动是平等且相互独立的,从而打破了人类优越而动物必须臣服的传统观念,<sup>⑧</sup>也打破了西方传统的“人类例外论”。哈拉维开创的理念认为,在与非人类动物的沟通时,人类不再展现出优越性或对自然世界的征服。儿童与动物之间发展的情感关系,为人类建构与动物的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儿童与动物的共情能力强于成人。在二元对立关系中,人类中心主义主导的思想认为动物没有疼痛感,没有理性,剥夺了动物的伦理价值。其后,在后人文主义思潮下,人们肯定动物同样拥有情感、拥有痛感,动物的情感也可以被感知。人类群体中,儿童相对于成人而言,更容易感知动物的情感。“同伴物种关系”

表明,人类和动物之间不仅存在一种关系,而且我们不能只考虑其中一个而忽略另一个,也就是说要重构人与动物的关系。就像菲利普·普尔曼(Philip Pullman)的《黑暗物质》三部曲中莱拉和她的精灵一样,在莱拉的世界,所有人以及其他物种都有自己的、可以看得见的精灵或灵魂,它们以动物的形式陪伴着主人。孩子们的精灵可以快速不断地改变形状,其中莱拉的守护神潘塔莱蒙(Pan)似乎是所有精灵中最灵活的,他可以从老鼠变成昆虫、鸟、松貂(他最后的形状)等。《黑暗物质》三部曲中的所有这些形状变化和思维敏捷都表明儿童与动物的同源性,揭示了物种共通的同理心。当莱拉在阴间入口被迫与精灵分开时,其他物种开始与莱拉感同身受:“她又回头看了看那肮脏阴暗的海岸,那里是如此凄凉,疾病和毒药肆虐,她想起了她亲爱的潘独自在那里等着,她的伴侣,看着潘消失在雾中,她陷入了暴风雨式的哭泣中……海岸沿岸,躲藏在池塘和浅滩里、受伤的生灵们听到了她伤心的哭声。”<sup>②</sup>似乎除了人类,其他生物和生命都被赋予了人的意识和情感。

在当代文化中,动物一直被有意地贬低,但这一趋势也促使部分读者和研究者同情并重新认识动物的遭遇,赋予动物叙事更深层次的意义和价值。从后人文主义立场出发,人们能发掘动物身份的更多可能性,如动物主体性身份,凯瑟琳·阿普尔盖特(Katherine Applegate)的《唯一的伊万》(*The One and Only Ivan*, 2012)、安东尼·布朗(Anthony Browne)的《动物园》(*Zoo*, 1992)、雅各布·韦格里乌斯的《凶手手中的猿》(*The Murderer's Ape*, 2014)等都突出了动物的主体性地位,促使读者进一步审视人类与想象的动物主体性之间的相互联系。特里·普拉切特(Terry Pratchett)的《猫和少年魔笛手》(*The Amazing Maurice and His Educated Rodents*, 2001)中老鼠与人最后共建一个社区。小说中,老鼠成为了正面形象,不再是邪恶的隐喻。当老鼠们帮助布林兹市的市民们重获和平生活后,人与老鼠形成了一种共生的生活环境,折射出作者的某种乌托邦想象。在与人类谈判的过程中,老鼠们明智地提出自身的实用价值,即可以帮助小镇居民消灭害虫,抓捕罪犯等。人与老鼠之间互惠互利,形成双赢局面:“城市会繁荣起来,所有人的孩子都会长大。转眼间,一切就变得习

以为常了。”<sup>③</sup>

后人文主义伴随着人文主义的危机而来,是对人文主义的反思和批判,旨在重新塑造人类和非人类世界之间的关系,重新思考“分类”和“边界”的问题,重新鉴定动物的含义。人与动物的概念不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动态变化、相互生成的。由此,儿童与动物的关系也在不断的变化和重构中。

后人文主义为重新思考物种间关系开辟了途径,有助于重新审视人类和非人类动物之间的边界跨越。大卫·麦基(David McKee)的《大长牙》(*Tusk Tusk*, 1978)或史蒂夫·安东尼(Steve Antony)的《绿蜥蜴与红矩形》(*Green Lizards vs. Red Rectangles*, 2015)等小说试图消解人类社会秩序中随意设定的边界,因为动物所表征的自然与文化二元对立可能会带来可怕的后果。大卫·阿尔蒙德(David Almond)的《野蛮人》(*The Savage*, 2008)、菲利普·普尔曼(Philip Pullman)的《我是老鼠》(*I Was a Rat*, 1999)、莫迪凯·格斯坦(Mordicai Gerstein)的《野孩子》(*The Wild Boy*, 1998)刻画了儿童与动物的杂糅形象,通过赞美野性来质疑人文主义的“儿童”概念。借助孩子意象,后人类主义者重新思考人类以及“野生孩子”、“野蛮孩子”或“作为自然之子的孩子”所发挥的作用,并审视儿童文学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质疑,为建构整体主义观念和物种平等主义观念提供借鉴和思考。

由此可见唐娜·哈拉维的“同伴物种”关系模型在研究人类和动物之间的关系时卓有成效。这种关系模型强调人与动物间的情感共通、相互依赖,人站在动物的立场,重新审视动物的“他者”地位。对动物的喜爱可能是一种强烈的相互情感的延伸,这种情感是双方平等的同伴物种关系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这种关系模型重新定位了人与动物之间基于相互尊重和平等原则的互动,颠覆了西方将人类视为特殊物种的传统观点。通过对儿童文学中人类与其他动物之间紧张复杂关系的分析,进一步颠覆人类特权和排他模式等陈旧观念。

## 结语

在儿童心目中,会说话的动物是和他们一样的平等存在。儿童文学促进儿童共情能力的生成,提供了一种对于人与动物之关系更加积极的思考方式,在彼此关系中获得重要意义。罗伯特·劳森(Rob-



ert Lawson)的《本和我》和乔治·塞尔登的《时代广场的蟋蟀》都突出了人与动物之间因尊重和关怀而结成的紧密关系。劳森的《兔儿山》(*Rabbit Hill*)和休·洛夫廷的《怪医杜立德》也提倡以尊重和关怀为基础得到延续的人与动物的关系。儿童和动物的流动性和互换性在儿童文学的叙事中特别明显,印证了儿童与动物的关系亦或是动物与儿童的关系都是一种文化建构。

当人们研究儿童文学和文化如何拉近读者与动物之间的距离时,目标与维多利亚时代的动物权利拥护者相同,即通过强调动物的基本主体性,揭示动物受人类摆布的现状。儿童文学具有颠覆性,以《黑骏马》为引领的作品公开为动物权利辩护。儿童文学赋予动物语言能力并开展对话,从而实现动物的主体性。然而后人文主义者希望打破物种主义作为一种基本制度的地位。随着每一代倡导者都将动物视为独立生命个体的存在,这一事业本身已经从为动物寻求基本保护转变为争取法律保障。唐娜·哈拉维的“同伴物种”关系概念的提出,重新定位了人与动物之间基于相互尊重和平等原则的互动,颠覆了将人类视为特殊物种的传统观点,认为儿童文学建构起的对话模式即使可能引发矛盾和张力等,也超越了数个世纪以对话的名义实施单一思想的人与动物的关系模式,为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诸多问题提供了借鉴和反思。

#### 注释:

①张生珍:《西方文论关键词:跨界小说》,载《外国文学》2022年第2期,100页。

②由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提出,试图说明整个生命世界是一个发展与联系的自然阶梯,这被后人称之为“伟大的存在之链”,其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

③曹文斌:《西方动物伦理的思想根基——人类中心论与机械哲学观》,载《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1-3页,7页。

④Sarah Kirby Trimmer, "Fabulous Histories, or, The History of the Robins", in *Masterworks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Vol. 3, ed. Robert Bator (New York: Stonehill, 1983), p. 274.

⑤舒伟等:《从工业革命到儿童文学革命:现当代英国童话小说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651页。

⑥Paul Shepard, *Traces of an Omnivore* (Washington: Island,

1996), p. 3.

⑦Andrew O'Malley,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Child: 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Childhood in the Late Eighteenth Century*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p. 11.

⑧John Locke, *Some Thoughts Concerning Education*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Inc., 2007), p. 91.

⑨David Perkins, *Romanticism and Animal Rights*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03), p. 20.

⑩Hugh Cunningham, *Children and Childhood in Western Society Since 1500* (New York: Longman, 1995), p. 67.

⑪Jean-Jacques Rousseau, *Emile*, trans. Barbara Foxley (Charleston: BiblioLife, 2008), p. 254.

⑫Jean-Jacques Rousseau, *Emile*, p. 254.

⑬Colleen Glenney Boggs, "Animal", in *Keywords for Children's Literature*, eds. Philip Nel, Lissa Paul & N. Christensen (New York: NYUP, 2021), p. 15.

⑭Ursula Le Guin, *Cheek by Jowl* (Seattle, WA: Aqueduct, 2009), p. 58.

⑮牛津大学的道德重整组织,成立于1921年。

⑯Jacques Derrida, *The Animal That Therefore I Am*, ed. Marie Louise Mallet (New York: Fordham UP, 2008), p. x.

⑰Amy Ratelle, *Animality and 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Fil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5), p. 14.

⑱Amy Ratelle, *Animality and 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Film*, p. 14.

⑲Catherine Elick, *Talking Animals in Children's Fiction* (Jefferson: McFarlan & Company, Inc., 2015), p. 77.

⑳Mikhail M. Bakhtin, *Rabelais and His World*, trans. Helene Iswolsky (Bloomington: Indiana UP, 1984), p. 11.

㉑Catherine Elick, *Talking Animals in Children's Fiction*, p. 21.

㉒Cary Wolfe, *What Is Posthumanism?*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 2010), p. xii.

㉓Michel Foucault, *The Order of Things: 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 (New York: Pantheon, 1971), p. 387.

㉔Pramod K. Nayar, *Posthumanism*. Cambridge and Malden. (Massachusetts: Polity P, 2014), p. 4.

㉕Jacques Derrida, *The Animal That Therefore I Am*, p. 416.

㉖Donna Haraway, *When Species Meet*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 2008), p. 16.

㉗Philip Pullman, *The Amber Spyglass* (New York: Yearling, 2000), p. 282.

㉘特里·普拉切特:《猫和少年魔笛手》,周莉译,文汇出版社2017年版,248页。